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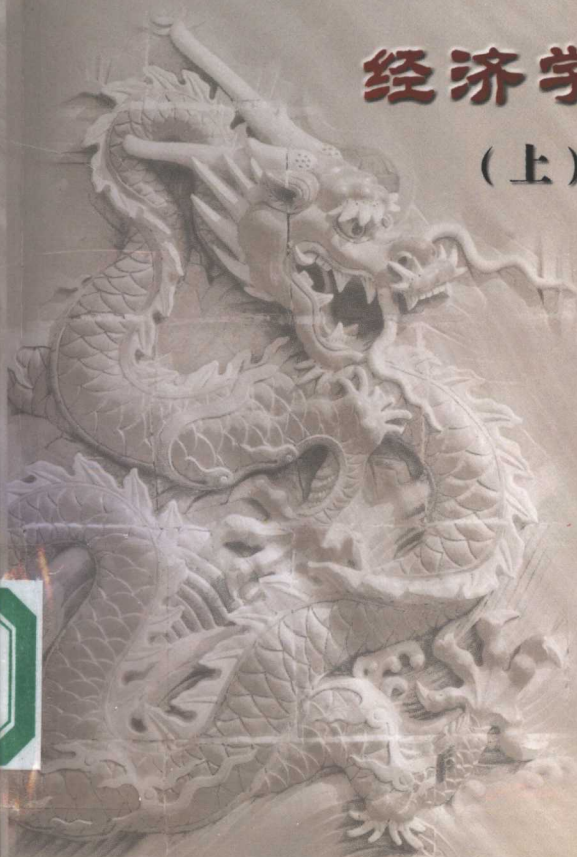
·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经济学卷

(上)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硕士文库

· 续编 ·
经济学卷
(上)



浙江教育出版社

编辑说明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系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所收论文大都具有比较重大的学术创见和理论意义。

首辑文库 1998 年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和较好评价。不仅专门研究者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学术信息和参考资料,广大参加自学考试的人们更将其作为撰写论文的范本,收集材料、形成观点的路径。初版千套,两月内即告售罄,可见社会有此需要,因此便有编辑出版续集的计划。

本书主要收集 1994—2000 年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毕业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位论文,并适当兼顾 1994 年前相关之优秀学位论文,凡 150 篇。全书分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六大学科卷,共 17 分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学术交流,对于入选学位论文,我们均请作者进行了精心的修改或必要的调整,有关情况详见各篇题注。

我们是立足于高度负责的学术立场、本着极其认真的学术精神,来从事本书的组织与编纂工作的。为了切实保

障本书独一无二的学术品质,仍特邀德高望重的于光远教授、季羨林教授、蔡尚思教授担任名誉总主编。王元化教授、任继愈教授等学界前辈任学术顾问。纪宝成教授、陈平原教授等知名中年专家任学术编委。

在本书学术顾问、学术编委的热情指导和学术界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作者自荐、专家推荐、权威遴选等多种形式,本书即将隆重奉献给学术界、教育界和读书界。本书之顺利编纂和出版,将不仅有利于系统地反映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辉煌成就,而且还有利于从一个基本的层面及时总结我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理论性、前沿性和创新性学术成果。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远在海外或者由于别的原因未能联系上的作者,虽其论文颇具社会影响,在学界评价甚高,然无法收录,不免有遗珠之憾。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已经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一样,本书将成为全面反映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方面最新成就、最权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我们热切期待着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关心与厚爱!

本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9月

目 录

上册

“市场失灵”分析	郑秉文(1)
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	王春法(76)
宏观调控绩效研究导论	杨秋宝(161)
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	李 珍(231)
中国转型时期的就业问题	杨宜勇(298)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	赖德胜(377)
当代中国城市化制度安排研究	刘传江(429)
论中国 50 年财政制度变迁的逻辑和后果	胡书东(494)

中 册

论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	王广谦(579)
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	李维安(686)
论法人产权制度	赵法生(750)
论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	顾海兵(792)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	于学军(808)
企业办社会研究	王延中(880)
论中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赵国浩(950)
房地产估价方法与应用研究	张协奎(1030)
论服务产品与非实物使用价值	李江帆(1112)

论国际服务贸易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李传桐(1194)

下册

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 毛蕴诗(1251)

互补竞争论 刘光溪(1320)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及政策选择 张汉林(1387)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经济战略 韩德强(1486)

明清江南地区家族人口的生育和死亡 侯杨方(1557)

论中国人地关系形成、变化及其前因后果 朱国宏(1629)

1949 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农业思想 钟祥财(1729)

“市场失灵”分析*

郑秉文

一、关于市场缺陷问题研究的回顾

(一) 经济思想史中关于市场缺陷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至少有下列三个特征:第一,自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是导致社会趋向和谐均衡的不可违背的“自然关系”。第二,协调性。利己心与同情心之间的矛盾状态,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集体利益(全社会利益)之间的对抗因素,都会通过市场过程自身结构内在的机制调整,协同推进,逐渐趋向公平和统一。第三,系统性。在不偏离个人私利的同时,社会公益可以达到最高目标,这是社会诸多经济因素通过市场过程相互集合与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某种单个因素独立发挥作用所致。

* 本文选自作者博士论文《市场缺陷分析》(导师为罗肇鸿教授)。这里仅做了删节,小标题有所变化。原文 28 万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尽管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在崇拜市场机制与分析市场作用优点的同时,还是或多或少地发现在个别场合下它也会偶然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像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样完美无缺,朦胧之间划上了一个“问号”。

最早对市场制度提出强烈质疑的是西斯蒙第(Sismondi)。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察觉”(马克思语)到自由市场制度似乎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分配不均衡。他说,工业的进步可能将导致产生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也就愈严重,前者受苦越多,后者越可以恣意挥霍,除非国家通过一些好像和增加财富的纯经济目的相反的制度”,否则,“富人就更加奢华,而穷人必然更穷”^[1]。第二,孕育着生产过剩的危险。分配不平均必然会引起消费不足,导致国内市场范围狭小,从而造成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对经济比例的失调。在他看来,比例遭致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力量运动的盲目性和自动调节的困难。他说:“在生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互比例中,如果发生不协调现象同样会有害于国家……这样,国家就要发生某些显然十分矛盾的危险。”他对经济比例的保持和恢复寄希望于政府的身上。为此,他鲜明地反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论。他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和亚当·斯密的结论有重大分歧的。”^[2]对于西斯蒙第揭示的市场制度这两个缺点,马克思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3]

继西斯蒙第之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R. Malthus)

在 1820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自由市场制度显示出了某种担心。他认为,财富增长的重要刺激因素之一,就是“不受阻碍的对全部产品的有效需求”。但他担心在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市场力量难以使之保持一种适当的比例,从而造成已生产出来的财富过剩和贬值。因此,他坚持认为国家应制定适当的政策,对与财富增长有关的一些因素的作用和各种比例关系加以引导^[4]。与西斯蒙第不同的是:第一,他不认为生产过剩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会无条件地必然发生;第二,他从人口原理出发,认为自由市场制度对不平等现象负的责任微乎其微,并认为平等制度既是不理想的,又是不现实的^[5]。

如同斯蒂格勒所描述的,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辩论中时常对市场制度存有“戒备之心”,但总的说来,它被人们广泛接受,因为人们相信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效率,它使沙子变成金子,而没有抱怨沙子的消失和金子的出现。但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经济学家们对天赋的、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制度的运转结果开始由含蓄的戒备变成大胆的怀疑,改良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于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史中首次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或改良主义者——穆勒(J. S. Mill)。经济思想史专家罗尔(E. Roll)指出:“在政府干预的反对者以及纯边沁主义的信徒们看来,穆勒丢弃了放任自由的理论,不仅仅是变节的行为……他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能够把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和政治上的妥协,捏合成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具有难忘的内容的体系……他比任何其他的英国经济学家,更多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中早期竞争性资本主义,伴随着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越地位,达到它的最高峰。但是他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新的问题在沸腾着引人注目。尤其是,只有以社会主义日益加强的挑战为背景,才能理解他的著述”^[6]。穆勒在其 184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竞争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指出了五点:第一,竞争的根本缺点是它不选取事物

的本质,而是采取事物的外在属性即不是价值而是价格作为核算标准。第二,在竞争中,人们不仅因为自己的工作成就而获利,而且也由别人工作的失败而取胜。第三,竞争市场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商业危机的商品市场状况”。第四,多数群众在市场条件下仍处于悲惨的境地,因为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总是与劳动成反比例,而大多数产品落到完全不劳动者手里。第五,他自认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所企求的不是颠覆私有制,只是改良它^[7]。

当一种思想萌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逐渐地趋于综合。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可以说是第一次大的综合。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史中对市场作用的诸多评价,尤其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穆勒综合”为20世纪初新古典派全面评价和分析市场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福利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市场失灵理论的思想渊源。

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论述市场作用时使用的一些经济范畴缺乏严密的定义和论证的话,那么,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主义(marginalism)并由此奠基产生的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便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市场理论。边际革命的结果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一,边际革命使“后来的许多贡献不胜枚举,这些促进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在1870年到1914年作出的”^[8],并最终形成了微观经济学。第二,“经济学家们醉心于对企业制度进行公开的、无条件的赞美,到了19世纪末,这种赞美遭到一次很大的中断,这发生在人们发现并普遍采取了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时候”^[9]。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创立的均衡价格理论对无垄断的微观经济现象作了最系统、最完整的分析,确立了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到20世纪30年代,罗宾逊(Robinson)和张伯伦(Chamberlin)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

垄断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者行为,提出了厂商均衡理论,从而使微观经济学最终形成。

(二) 福利经济学与市场缺陷研究

边际主义的产生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得以运用价格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市场“怀疑论”进行缜密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当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市场和谐状态已不复存在,并明显地呈现出种种弊端,经济学家开始分析这些弊端和探讨国家对其进行纠正的措施。英国学者霍布森(J. A. Hobson)在对垄断资本主义作了深入考察之后,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干预的范围不仅包括分配领域,还应包括生产领域,主张通过赋税消灭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和老年抚恤金,提出进行失业救济和工资评议等一系列“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倡导发展公用事业,对一些企业进行直接的管制,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明确提出要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列宁曾对霍布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0]。

霍布森提出的“最大社会福利”思想对后来庇古(Pigou)创立的福利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庇古继承了从穆勒到马歇尔这一“边沁功利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的传统,于1920年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它的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产生。

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作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它第一次将市场失灵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门领域加以研究。庇古至少作出了如下三个重要贡献^[11]:

第一,确立了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庇古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市场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是边际私人净产品与边际社会净产品相等,亦即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边际社会净产品相等。市场的作用就是通过自由竞争和社会经济资源的自由转移来实现上述的诸条件,从而使经济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达到最优。

第二,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庇古认为,要增加社会福利,就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因为,一个人手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其边际效用就越小,反之则相反。但市场机制对收入均等化无能为力,国家应通过征收累进税的办法把富人的一部分钱收来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让低收入者享用,缩小贫富差距,以增大社会福利。当所有人的收入均等从而使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时,社会经济福利就会达到最大化。

第三,确立了外部性理论。在继承了马歇尔的“外部设备经济”概念之后,庇古首次对外部性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边际社会净产品与边际私人净产品常常产生的背离现象,其实质就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只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才能消除外部性。

1938年和1939年,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卡尔多(Kaldor)、希克斯(Hicks)、伯格森(Borgson)几乎同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随后,萨缪尔逊(Samuelson)、格拉夫(Graaf)、李特尔(Little)、西托夫斯基(Scitovsky)、鲍莫尔(Baumol)、阿罗(Arrow)、黄有光等一大批当代新福利经济学家群体崛起。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亦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

法国经济学家勒帕日在评价旧、新福利经济学时说,旧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其实很简单,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发现,即市场远远不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完美无缺……换句话说,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并不一定导致传统探讨所设想的那样完美结果。而新福利经济学自战后的到来,这种福利理论成了经济研究最热门的活动领域之一。20年代以来,一整套新文献都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深入研究国家干涉的合理性”^[12]。如果说旧福利经济学主要是以边际效用论为分析工具,将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

会福利最大化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话,那么,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帕累托最优作为研究的核心,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考察市场经济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将“市场缺点”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下面按照年代的顺序列举几位主要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研究的范围所作的简要论述。

1923年,美国的奈特(F. H. Knight)在其《竞争的伦理观》中对竞争市场制度提出了四点异议:第一,市场的知识不完全性。第二,市场力量易导致垄断的产生。第三,市场的外部性。第四,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因为它基本上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收入,个人努力只占很小比重^[13]。

1949年,美国的鲍莫尔在其博士论文《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中系统地研究了市场的外部性和垄断产量问题,并简单地探讨了公共产品的某些例证。这篇博士论文后来被布劳格认为是“对完全竞争下市场失灵意义的早期论述之一”^[14]。

1954年、1955年,萨缪尔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认为市场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不按最优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他在讨论了公共产品最优数量的决定之后,指出必须由国家主持并通过财政预算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它的供给问题^[15]。

1958年,巴托(F. M. Betor)在其著名论文《市场失灵分析》中对市场失灵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发现有五种原因可导致市场失灵:第一,当交易者之间存在障碍使自愿交易发生困难时。这种障碍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交易双方在商品占有量上不对等。二是购买者缺乏足够的市场信息。三是谈判造成的困难。第二,当交易者双方的交易界区不清楚时。这里主要指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公共资源的产权模糊性。第三,当某些物品的产权难以人格化时。第四,当市场形成垄断时。第五,当市场存在外部性时。巴托认为,国家应对市场的这五种失灵现象进行补救^[16]。

1960年,罗逊夫人对市场机制指出了四个缺点:第一,收入分配的武断性,即市场解决不了公平合理的收入问题。第二,市场价格持续不断的波动性。第三,市场的未来不可确定性。第四,市场的投机性,指幸运的可以“靠缺货引起的高价而发财致富”,“平步青云”^[17]。

1986年,凯恩克劳斯(Cairncroes)指出:经济学家们可以列出市场失灵和弱点的很多单子,有的缺陷是与垄断相联系,有的是由于忽视或不完全了解市场,有的是由于各种外部性造成的私人和社会代价与利益之间的偏离,有的是由于易于遭受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等。^[18]

1987年,罗普(R. Ropar)和斯诺顿(B. Snowdown)说,从广义上讲,市场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存在市场的不完全性。二是存在外部性问题,包括公共产品。三是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四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问题^[19]。

1989年,迈耶(B. Meler)认为市场有四种缺陷:“第一,市场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在市场不完全性的情况下。第二,市场结果不正确——在外部性的情况下。第三,对于相关的活动市场不起作用——在公共产品的情况下。第四,市场结果不合理——指资源配置。”^[20]

上面各个年代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的论述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还是难以全面概括“市场失灵”的主要内容。不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现代福利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现象研究的范围越来越集中在这样一个范围:公平与效率问题、经济周期与失业问题、垄断与竞争问题、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等。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对外部性和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十分活跃。

以上论述似乎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1. 旧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对市场制度的优点和缺点的评价,而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新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则越来越移向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上面。这样,笔者对现代福利经济学下的定义就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评价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劣,其中,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与研究就构成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基于对新福利经济学的上述理解,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市场失灵理论的核心部分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早就有一些学者甚至把福利经济学与市场失灵理论画成等号,把福利经济学直接看成是市场失灵理论。例如,布坎南(Buchanan)就曾指出:“在几个场合中我都总结道:本世纪中叶出现的理论福利经济学是‘市场失灵理论’,而在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政府失灵理论’。我的这个评论抓住了这两个研究课题的要害。”^[21]

(三) 市场失灵的定义

1.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的 18 世纪末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市场机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对效率具有某些“限制”(limitations)。但“市场失灵”一词的出现则是 20 世纪中叶的事情。据目前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首先使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一词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国际研究中心”的巴托教授。他于 1958 年在美国的《经济学季刊》秋季号上发表的《市场失灵分析》一文中,正式公开地使这个概念见诸于理论著述之中(见有关注释),从此,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地使用。

2. 什么叫“市场失灵”?其含义是什么?巴托教授在该论文中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予了回答:至少在分配理论中,市场失灵是指在多少比较满意的理想价格市场制度中不能达到“合意”的活动(巴托所说的活动是指广义上的生产与消费的活动——引者注),或指不能阻止“不合意”的活动。反过来讲,它与对一项

活动的“合意性”的评价有关系,与一些若明若暗的“最大福利函数”问题的价值解释的评价有关系^[22]。

3. 如何理解市场失灵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新福利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某些学者存在一些非原则性的分歧。所谓标准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合意性”(desirability)的理解问题。

一般说来,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所谓市场价格制度的合意性,是指市场的效率问题。但是,它绝不是指“现实生活”(in the real world)中的市场效率,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许多事情都是违反“一致性”(correspondence)的。例如,事物的变化具有一种惯性和抗力,商人具有寻求“平静生活”的欲望,等等,这样,“现实生活”中就充满了人为“操纵”的不确定性因素。而这些因素的性质都是不可计算的、是非静态的。福利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效率,是指在静态下,即在给定的技术、偏好和生产者动机的“强烈假定”(strong assumptions)之下,竞争市场的均衡条件将准确而严格地遵循着帕累托效率的要求^[23]。

有些学者还指出:“理解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是首先要理解市场成功,亦即理解理想的竞争市场获取资源均衡配置——帕累托最优——的一种能力。”^[24]

但是,布坎南虽然赞同市场“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被广泛地认为是经济资源运用的效率问题”,但他还认为,既然效率是通过市场过程的运行而获得的,那么,就很难再把效率作为一个独立的标准来评价市场过程本身。当然,布坎南接着又说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巧妙制造的味道”,因为它涉及政治学和政治程序的问题^[25]。

我们知道,最大经济福利是任何社会追求的最高的经济目标。而经济福利必然与经济效益有关,因为,一个社会是几乎不可能在低效率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的经济福利。而帕累托最优是对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是对市场资源配置的一种状态转化为另

一种状态时福利增进或减少的某种评价。虽然它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过于偏狭,甚至有些西方学家提出要对它加以充实和改革,但至今它毕竟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定理,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似乎正是由于这一点,也说明了福利经济学理论具有脆弱性的一面。现代福利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场失灵就是指市场成功无法充分实现,亦即指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这种意义上说,有人称“福利经济学基本上是关于资源配置上的效率的学科”^[26]。

二、市场失灵与帕累托最优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相对来说它不能或无法充分实现“市场成功”,而“市场成功”则是指在给定的偏好、技术和动机的条件下社会经济资源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一) 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四条途径

帕累托最优这个命题问世近一百年来,被无数经济学家加以改进、修补,至今被西方经济学家基本公认为是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标准,但同时也受许多学者的责难。对帕累托命题讨论最多的恐怕就是其实现的途径问题了。既然帕累托最优是一经济的最佳状态,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如此完善的境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才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对此,西方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仅举其要:威尔斯(Wiles)认为,从纯理论上讲,帕氏最优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即完全竞争、完全集中调节、完全计划^[27]。庇古称一种具有完全歧视性垄断者的制度也可以达到帕氏最优。还有人提出某种“贪婪过程”也能达到帕氏最优^[28]。

1. 完全计划与帕累托最优。

一些经济学家把完全计划能够达到帕氏最优与利昂惕夫(Leontief, W. W)的名字联系起来,认为利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